



昨天北京空气污染“爆表”，上海也发布黄色预警。代表委员再话治霾 环保治理投入占GDP比重实在太少

真金白银为何没换来“天蓝水甜”？

代表委员建议尽快扭转环保投入“低效症”

一些代表委员在审议报告时指出，我国政府始终没有放松环境治理，保守估计最近10年用于环保的总投入应在4万亿元左右，之所以环境问题仍没有大的改观，症结之一是环保投入上存在“低效症”。他们建议，“好钢用在刀刃上”，在进一步加大环保投入的同时切实提高利用效能，用真金白银换来“天蓝水甜”。

造假、地方保护主义是祸根

一些代表委员指出，导致我国在环保投入上效率低下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原因还是是一些地方、企业在环保问题上手法翻新造假，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唯GDP论的旧思维诱发的地方保护主义。

“环保治理效率低，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治理体系系统性不强，头疼医头，各个环节缺乏衔接。”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兆泰投资集团董事长郭向东说。另一方面，环境治理中“造假现象”是祸根——许多环保设备“睡大觉”，花的钱“打水漂”。有环保设备，污水却从别的管道偷排；上级检查时，才开启环保设备；采购设备时做手脚，导致环保检测数据失真……

2012年9月，环保部环境安全百日大检查督查组发现，中石化广东湛江东兴公司部分生产废水通过雨水系统直接外排，而另一下属公司湛江新中美公司擅自拆除废水处理装置，污染物可通过阀门切换，直接排入雨水沟。

“污水处理厂等治污设施形同虚设的状况在全国并不少见。”全国人大代表宋心仿说，出现这些情况，往往是部分企业唯利是图，在当地政府的保护下肆意妄为。一些地方政府抓环保是搞花架子和面子工程。

加大执法力度“设红线”

一些代表委员建议，应尽快扭转环保投入“低效症”，一方面要让环保投入成为“硬约束”，更重要的是要加大执法力度，让造假者和地方保护主义不敢触碰环保“红线”。

“当前治污的关键，就是要把环保投入变成‘硬约束’。我国经济总量大，但环保投入相对小，应提高环保投入占GDP的比例。”全国政协委员、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说。

一些代表委员建议，未来十年，环保投入占GDP比重至少要提高到2%，甚至3%。“当前环保投入仍然不足。”全国人大代表、山西潞宝新能源集团董事长韩长安认为，我国发展这么快，环境污染问题如此迫切，政府对环保的投入力度应该更大。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保证这些投入都发挥出最大的效益，这就需要我们加大环境违法的执法力度。”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说，必须通过环境执法让地方政府和企业痛知什么是不能触碰的红线，这样才能保证污染永远被挡在外面。”新华社记者 顾瑞珍 赵仁伟 吕晓宇 傅勇涛

局长张全认为，造成大规模灰霾天气，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中东部地区重化工业布局过于密集，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耗过大，机动车保有量增长过快。由于区域功能布局不合理，污染排放过于集中，一旦遭遇不利于大气扩散气象条件，重污染天气就难以避免。

“按照目前的环境管理体制，地方人民政府和环保部门只对所辖区域范围内的环境质量负责。由于大气污染具有流动性强、流动的范围大等特点，只靠某一省市或者某一地区的努力是不够的，不能有效防治大气污染。需要区域内的各省市、各地区协同合作，采取联防联控措施，才能达到较好的污染防治效果。”

此外，PM2.5的重要污染源，机动车废气排放管理问题，相关法律法规也不尽完善，存在超标不能处罚，异地注册车辆难以管理等问题。

为有效应对灰霾天气，张全建议尽快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增加“区域大气污染防治”专章，明确区域大气污染防治体制、机制，补充完善机动车管理的相关制度。

特派记者 潘高峰 姚丽萍 江跃中

“PM2.5抗体”的说法，他觉得非常荒谬，“一个人一天要呼吸10000多升空气，PM2.5作为颗粒物本身还是一种载体，可以携带二氧化硫甚至病毒，进入人体肺泡并被巨噬细胞吞噬，从而永远留在那里，共同影响肺功能。”

“我们对GDP的追求还是指标性的，虽然降到7.5%，地方如果达不到还是会觉得很没面子。”关于空气的治理，钟南山认为首先需要的是政府、企业和市民观念的转变。他建议把环境保护也作为衡量政府工作业绩的重要指标，政府能够给环保部门真正的执法权，让其可以直接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处罚。在技术层面，钟南山认为要解决造成灰霾的主要祸首“机动车尾气”，必须提高重要油品标准。

“中国人上下一心，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从现在开始，如果政府真正开始治理，百姓努力放弃对环境有害的生活方式，不超过10年，就会有明显效果，我有信心。当然，我希望自己那时候还活着。”钟南山说。

联手治理 多省市各地区协同合作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环保局

污染又接踵而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投入严重不足。潘碧灵说，2011年我国治理投入仅占GDP的1.45%，离环境质量有效改善的3%相差甚远。环保部评估显示，我国环境质量局部有所改善，整体还在恶化。按《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评价，全国33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有2/3以上城市达不到二级标准。更堪忧的是，曾经视为净土的农村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到全国污染物排放的“半壁江山”。

潘碧灵认为，目前的污染治理，除了缺钱外，还有四缺：国家层面缺乏完备法律；政府层面缺过硬措施；社会层面缺保护共识，企业作为小；工作层面缺整体合力。

现在治理 10年内就会有明显效果

“如果在吃饭喝水呼吸都成问题的情况下，GDP世界第一又有何意义？”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的质问发人深省。

在接受采访时钟南山表示，灰霾对人的神经、内分泌、母体、肿瘤的影响是肯定的。而对于有人提出的

昨天，北京空气污染指数一路飙升，再次“爆表”，上海傍晚也发布了空气污染黄色预警。代表委员们散会出门，一声叹息。“美丽中国”的愿景笼罩在一片灰霾之中。

空气污染如何治理？这个问题已经在两会上反复谈起，但还是要说。甚至有委员建议组织一次集中议政，专门讨论PM2.5的防治。昨天下午举行的政协大会发言上，全国政协委员潘碧灵更是疾呼：目前环保治理投入占GDP的比重严重不足，根本无力扭转现状。

污染治理 除了缺钱，还有四缺

“雾霾飘在天上，根子却在地上。”湖南省环保厅副厅长潘碧灵委员认为，高能耗生产、超承载力排放、低水平防治，势必给人类、给地球以环境恶化的回报。他举了一组数字：2010年，我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总量世界第一，工业烟尘尘排放量1446万吨，远远超出环境承载能力；2011年，我国煤炭消耗量35亿吨；2012年，我国汽车保有量超过1亿辆，传统的煤烟型污染尚未解决，机动车、重化工业造成的PM2.5、臭氧

两会影话

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满手资料，满脑子数据，准备了两份书面意见、两份议案，主题当然都跟环保有关。PM2.5知名度剧增，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前排右一）也成了媒体的“热点关注”。面对关注，张全说：“媒体朋友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特派记者 陈正宝 姚丽萍 摄影报道



有授权、无监督，乱收费现象泛滥。全国政协委员周汉民呼吁——把收费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

“目前，全国有多少收费项目？收费总额是多少？收费主体是谁？收费用途是什么？没人能够说清楚。”

昨天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用一连四个问号，开始他的发言。

“不收白不收”

“有人说，全国一年仅公路罚款就达3000亿元，很大一部分是不合理收费，有的车辆的公路罚款和其他开支之比可以达到1:1。有企业说，小企业的营业税是3%—5%，而小微文化企业缴纳文化基金一项收费就是3%……”周汉民说，国家一直在整顿乱收费，但乱收费现象并未根本改观。究其原因，根源在于有授

权、无监督。

这种有授权、无监督具体表现在多个方面：收费欲望被放纵，收费范围被不恰当放宽，收费时间被延长，收费用途被改变，收费监督被漠视，收费权限被外包。比如，行政收费权的设定权应该在人大，但人大常常采用“授权”形式赋予行政收费权，而这种授权一旦作出，后续监督处于缺失状态，导致各级各类管理部门在“不收白不收”的心态下，挖空心思编织收费理由，骗取收费授权。

又比如，许多收费项目有始无终，即使是有明确期限的，也形同虚设。我国一些早期的高速公路、桥梁设施，在超过收费期限后，依然收费不已；郑州公路大桥贷款还清后16年还收费；更有一些地方政府在路桥收费期限临近时，采取出售转包的办

法，一次性收取巨额转包资金后，让接盘者继续收费。

加上“五道锁”

如何把收费权关进“笼子”？周汉民认为，短期而言，迫切需要乱收费加上“五道锁”：

限量 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暂停一切收费项目授权，清理大范围、大数额收费项目，确保收费总量大幅减少；

限责 把行政收费总量占比纳入常规统计公布的信息范围，规定收费必须履行的责任，不愿公开收费目的、用途的不予授权；

限权 所有收费项目的主体不得变更、转移，严禁收费权外包；

限用 对收费超范围、超规定，使用中存在私分挪用的部门，一定期限内不得申请增加收费作为惩戒；

限时 所有收费授权必须有严格时间限制，超时收费必须实行追诉追究制度。

周汉民认为，这五限只是治标之策，从中长期来看，则要建立公开、公平、透明、完善的收费法规制度体系，《行政收费法》亟待出台。与此同时，还要建立收费许可授权的多元评价体系 and 收费使用评价制度，进行公开、广泛的听证制度，把行政收费的数量、使用情况等，作为政务公开的常规事项。此外，还应完善企业和公民申诉制度。当前缺乏对乱收费的惩罚制度。比如，警察罚款即使通过申诉被证实不当，也只是取消处罚，缺乏赔偿机制。完善申诉制度，就是要赋予企业和公民对不当收费申诉胜诉后获得赔偿和补偿的权利。

特派记者 潘高峰 江跃中 于明山